

计划生育大家谈

关于广东省计划生育工作的几点思考

深圳市计划生育宣传教育中心 赖明传

(深圳市 518028)

广东省的计划生育工作,近年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人口出生率从1979年的23.44%下降到1995年的18.10%,总和生育率也从1979年的3.77下降到1995年的2.05,并在“八五”时期,首次完成了人口计划。

但从总体上观察,广东省的计划生育工作至今仍未改变被动落后的局面,而且与全国其它省市相比,在主要统计指标方面还有所退步。有关资料显示:广东省的人口出生率、计划生育率两项指标,已从1990年全国排序的第16、15位,退至1995年的第22、28位;多孩出生率也排在全国的第27位。

广东省的计划生育工作长期处于被动落后的局面,不仅构成了对经济、社会和未来发展等各方面的不利影响,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它还损害了广东省在国际、国内的形象,并影响到广东省各级党组织和政权机构的权威性以及各项政策、法规的严肃性。因此,尽快改变和扭转这种局面,已经成为摆在广东省各级党政领导面前的一项极为紧迫和重大的问题。

广东省计划生育工作被动落后局面的形成,具有多方面的原因,改变和扭转这种局面,当然也需要我们做出多方面的努力。那么,哪些原因是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我们应该如何去克服和解决这些问题?这些,是每一个有责任心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者应该经常去思考的问题。本文就是作者根据平时所做的观察和对有关数据的分析,对这一问题所做的几点思考。

一、必须摆正经济发展与人口控制的关系

唯物辩证法认为:人口因素可以对社会的发展起到加速或延缓的作用。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

口多,底子薄是我们的基本国情。因此,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始终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

以上这些道理,我们各级党政领导无疑是知道的。但是知道是一回事,如何去实践又是另一回事。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人口控制的关系,不仅仅是一句时髦的宣传口号,它需要人们付出实实在在的努力,需要人们脚踏实地的真抓实干。

广东人经常为自己所取得的辉煌的经济成就而自豪,外省人也时常为广东人对经济目标孜孜以求的精神所折服。的确,自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借中央政策之天时,挟毗邻港澳、面对东南亚之地利,再加上敢闯、敢冒、敢开改革开放之先河等有利条件,使广东迅速成为了全国最富庶的省份。从1978年到1995年,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广东省的国内生产总值从184.73亿元增至5441.15亿元。增长了近30倍(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10倍)。在这些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之中,饱含着广东人民的聪明才智和辛勤汗水。

然而,我们却不能不看到,由于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忽视和放松了人口控制工作,由于计划生育工作未能得到实际的重视,大量盲目、过快增长的人口,不仅部分抵消了广东省在经济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并且还给今后的发展,造成了难以摆脱的危机。

有关资料显示:虽然从经济总量上看,1995年广东省依然位居全国第一,但从人均经济指标看,在许多方面其实已无优势可言。例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广东仅比浙江高出76元(按百分比计算,仅高出

不到1%)。而在1990年,这个差距却是418元(按百分比计算,高出21.4%)。从农民的人均纯收入看,广东省则已连续几年落在浙江之后了。

通过进一步的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八五”时期,广东、浙江两省的经济各项指标的增长速度大体相当。在有些方面,广东还高于浙江。这一现象提示我们,浙江与广东在人均经济指标方面差距的迅速缩小,并在某些方面已经超出,其主要原因并非在于经济增长速度上的差异。

在人口控制指标方面,两省存在的差距是十分明显的。“八五”时期,浙江省的年均人口增长率为7.56%,而广东省则为16.2%,是浙江的两倍多。整个“八五”时期,浙江共增加人口119.5万人,而广东则增加592万人,比浙江多增加了470多万人。

在计划生育工作指标方面,两省之间的差距更为悬殊。“八五”时期,浙江省的年均计划生育率为93.02%,广东省为65.79%,比浙江低27.23个百分点;年均多孩出生率指标,浙江省为1%以内,而广东则为18.93%,比浙江省高出了近18倍。

现在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了:正是因为实际工作中没有摆正经济发展和人口控制的关系,忽视了计划生育工作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极端重要性,对于计划生育工作中所存在和出现的问题,又缺乏一抓到底的决心和信心,所以才最终导致了上述的经济现象和结果。然而,问题的严重性还不仅于此。由于人口发展的内在规律作用,由于广东省的人口控制工作和计划生育的调控能力至今仍相当薄弱,也由于进入“八五”时期,广东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政策、人才和资金引进等方面已渐无优势可倚,所以,当上述的趋势一旦形成,将很难在短时期内得到扭转。在未来的几年内,浙江省在人均经济指标方面全面超过广东省几乎已成定局。

被人超越的结果总是难以让人接受的,但是更为重要的却是我们的各级党政领导,应该从这一难以接受的事实中汲取到足够的教益,并从此在人口控制和计划生育工作中,切实地担负起“亲自抓、负总责”的光荣历史使命。

二、在人口问题上必须树立“忧患意识”

1968年4月,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的林赛科学院,一个当时还鲜为人知的学术团体—罗马俱乐部成立了。罗马俱乐部在它有关全球问题和“人类困境”的研究中,充满了对人类未来的“忧患意识”,以至于有人把它列为全球问题研究中的悲观主义代

表。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它的第一个报告《增长的极限》,用大量的数据和简单明了的逻辑,阐述了地球有限论的观点。以后又相继提出了有机的增长,把经济学和生态学结合起来,加强对新技术革命社会作用的预测等观点。从而引起了世界各国对全球问题的广泛关注。20多年过去了,当“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观点终于被世界各国普遍认同并接受的时候,人们不会忘记这个对人类未来充满着“忧患意识”的罗马俱乐部。正是他们坚持不懈的理论研究和传播,才导致了“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产生和完善。

中国人信奉孔子的中庸之道,讲究“知足长乐、随遇而安”,而缺乏对未来的“忧患意识”。然而,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和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广东人确实应该多一点危机感,多一点“忧患意识”了。

广东省气候温暖、热量充足、雨水充沛、土地肥沃,十分适宜粮食和农作物的生长。可是近年来广东的粮食生产,尤其是粮食的人均产量却出现了负增长的现象。有关资料显示,1978年到1995年,广东省的粮食总产量每年仅以1%的速度递增,远远低于同期2.09%的人口增长速度。广东省目前已经成为全国的缺粮省,而且这种趋势已经发展到了难以逆转的地步。

广深铁路沿线楼房林立,但显而易见的缺乏合理的空间,有的地方几乎已经到了见缝插针的地步。这样的现象,恐怕不仅仅象征着商品经济的发达,广东人的生活空间,已经变得越来越小了。

有关数据表明:广东省的资源对人口的负荷已严重超量。早在1990年,每百亩耕地的负荷人口数已为165人,是全国平均数的2.06倍,在全国居28位,仅优于北京和上海。在资源人口容量和资源人口承载力两项指标上,广东省目前的实际人口业已超出标准值的1倍以上。

也许不需要再举出更多的事例了,因为这一切本来就是每天都能耳闻目睹的事实,只是我们还不善于把它们与我们的未来经常的联系在一起,只是我们还不习惯用“忧患意识”来思考这些令人担忧的现象和问题。

我记起了中共浙江省委一位负责人在1989年初讲过的一段话。他针对浙江省人多地少、资源贫乏的省情,严肃地告诫全省各级党政领导:“人口失控是最大的失控,也是最难纠正的宏观失控。控制人口增长,各级党委政府必须要有忧患意识。”从某

种意义上说,浙江人民正是在这种带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紧迫感的“忧患意识”的激励下,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始终把人口控制和计划生育工作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坚持不懈地抓紧抓好。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终于使浙江省的人口走上了良性发展的轨道,并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健康、高速发展。

当前,“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热门话题。人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人口因素是“可持续发展”诸因素中最重要因素。人类如果不能合理地控制自己,那么必将会给环境、资源、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并贻患于子孙后代。因此,我们各级党政领导,必须要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负责的思想高度出发,重视并做好人口控制和计划生育工作。在人口问题上,必须树立“忧患意识”。

没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就难以产生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紧迫感;没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紧迫感,就难以改变和扭转广东省人口控制和计划生育工作的被动落后局面。我们已经丧失了太多的时间和机会,我们还有时间和机会,但是,时间和机会确实已经不多多了。

三、必须加强农村基层组织的建设

在我国农村,哪一个层次属于基层,目前尚有不同的看法。但在我国的社会学研究中,通常把行政村作为社会研究单位。因此,本文讨论的农村基层组织,也按照上述分类,把村级基层组织,定义为农村基层组织。

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是一项关系到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农村改革成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及引导广大农民坚定地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工作。

由于计划生育工作的难点和重点都在农村,计划生育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具体工作任务,都需要通过农村基层组织去贯彻、落实。因此,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对于做好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对于改变和扭转广东省计划生育工作的落后被动局面,同样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

建设一个好的党支部,是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关键,它同样也是做好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关键。但是,怎么样的党支部才算是一个好的,或者说是一个合格的党支部呢?计划生育工作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也是各级党组织(当然也包括农村基层

组织)必须应该做好的一项经常性的重要工作。可是在广东省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实际操作中,计划生育工作仅被列为“创造一个好的社会环境”中的一个内容。在百分制的验收评分表内仅占3分。按照这样的操作评分办法,我们有理由担心,一个没有完成计划生育工作任务的农村基层组织,照样可以通过考核验收,甚至可能成为一个获得高分的农村基层组织。据有关部门的情况介绍,在广东省的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实际工作中,到1995年底已有三分之一的农村基层组织通过了考核验收,但同期省计划生育委员会统计的计划生育合格村的比例仅为9.2%。这两组数据提示我们:在这些获得考核通过的农村基层组织中,至少有三分之二没有完成(或者说没有很好地完成)计划生育工作任务。

如果我们至今仍对这样的现象熟视无睹,如果我们至今仍不能够把做好计划生育工作作为考核各级领导班子(当然也包括农村基层组织)的必要条件和重要标准,在我们的工作中真正落实计划生育工作的“一票否决权”制度,那么,我们就难以从制度上促使各级党政领导,切实地树立起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责任意识,改变和扭转广东省计划生育工作的被动落后局面,也将成为一句美丽的空话。

发展集体经济,壮大集体经济的实力,这是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基础,也是做好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农村的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经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这主要是由于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得以发展的结果。不可否认,作为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各种类型的非公有制经济对广东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去看待这一现象,这些经济形式在为广大农民提供了物质财富的同时,客观上也削弱了农村基层组织在当地社区内的权威地位和号召、指挥能力。目前一些地方的农村基层组织作用难以发挥,计划生育工作难以开展,其深层次的原因,就是集体经济的实力过于薄弱。

中共广东省委决定每年从扶贫基金中划出2500万元,连续三年共投入7500万元,用于扶持贫困县中集体经济年纯收入仍在3万元以下的农村管理区(即行政村)发展集体经济的举措,确实是具有战略眼光的治本之举。我谨从做好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角度出发,希望在资金的运用过程中,能注意与当前各地开展的计划生育“三结合”的工作有机地联系起来,以期达到既壮大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实力,又

推动和促进了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双重目的。

四、必须克服地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

文化,作为人类在社会历史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无论我们从广义还是狭义的角度去考察,都会发现它有着历史的延续性和民族的、地域的差异性。

所谓地域文化,即不同土地界域内的文化。这种文化由于受到不同地域的地理环境、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生活习俗和语言等方面存在的差异的影响,必然会形成一些有别于其它地域的,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当然也包括人口发展)能够产生促进或制约作用的内涵和特点。

广东省的计划生育工作,至今仍未摆脱被动落后的局面,客观地分析存在的问题,这里面既有工作方面的问题,也具有地域文化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广东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极具地域特色的岭南文化培育了一代又一代聪明、勤劳、注重实干且不尚空谈的广东人。但是,在对广东地域文化的考察中,我们确实也看到了一些必须引起人们注意的,对人口控制和计划生育工作产生不利影响的消极方面。

广东的文化与长江三角洲的文化相比,具有明显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在广东,大到一个企业的开张庆典,小到一个人的生老病死,都离不开一大套眼花缭乱的,带有迷信色彩的活动,认真分析其中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古代的岭南的生活环境恶劣,人们深切地体尝到大自然的变化莫测,并把这一切均归结为神鬼所为,因此长期以来,形成了岭南文化中敬鬼尚神的风气。其次是港澳文化和东南亚“华人文化圈”的消极影响,比如广东人喜欢“6”和“8”,在公司和企业中供奉财神爷的风气,就是比较典型的港澳“引进版”。

广东文化的封建迷信色彩,还表现在宗族观念至今仍根深蒂固。在广东的农村甚至城市的郊区,我们都可以看到大小、造型各异的“祠堂”。里面则一律供奉着记载了整个家族繁衍和发展历史的“宗谱”。作为封建文化和封建家族制的标志,没有任何东西能比“祠堂”和“宗谱”更具代表性了。在长江三角洲一带的农村,我们如今已极难找到这类建筑,可是在广东的农村,这些早已被现代文明摒弃的东西,却依然存在并实际地统治和禁锢着许多人的思想和行为。于是,“传宗接代”、“重男轻女”这些源于封建

文化和封建家族制的陈腐观念,也就毫不奇怪地依然束缚和支配着许多广东人的生育观念和和行为。

当我们从总体上观察广东的文化时,我们会发现,它呈现着一种二元并存的格局,即经济上的相对开放与意识形态上的相对封闭同时并存。这种二元并存的格局,弱化了经济对人口发展的决定作用,使人们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的转变,明显地滞后于经济的发展。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种因文化差异而对人们的生育观念和和行为产生影响的现象呢?“经济决定人口”是马克思主义人口论的基本观点,是被实践证明的正确的理论。但是我们只要经过认真的观察就会发现:经济决定人口并不表现为自发的、直接的形式。人们的生育行为,受制于人们的生育观念。而生育观念既属于狭义的文化范畴,又取决于广义文化的影响。因此在一般情况下,经济对人口的决定作用,实际上是通过改变文化的内涵而实现的。

值得引起注意的是:这类因地域文化的差异而对人们的生育观念和和行为产生影响的现象,并不是一种个别的、偶然的,它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如中东的产油国虽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都超过了1万美元,但其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却比我国高一倍以上。广东省的计划生育工作至今没有改变和扭转被动落后的局面,地域文化中的消极方面所产生的影响,是一个不容忽视和低估的重要原因。

因此,在人口控制和计划生育工作中,我们应该重视和加强对地域文化特点、以及这些特点对于人们生育观念和和行为影响的研究,并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努力去克服改造那些消极、落后的方面,以使得历史悠久的广东文化,能够在保持自身地域特色的同时,得以不断地更新和发展,并日益符合现代文明的要求。

当我终于完成了这篇论文的时候,我感到了一种缺憾和犹豫:通观全文,措词过于激烈而理性的思考略显不足,同时又缺乏可供操作的对策。这样的“思考”,广东的同志能够接受吗?更何况我本人目前也已经成为了广东人中的一员。古人曰:“位卑犹未敢忘国”,我是敬佩这种精神的。于是,我还是下了决心,把这篇可能引起争议的“思考”提供给大家。但愿它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使更多的有识之士来关心和研究广东省的人口问题。